

■学人素描

张汉林：为自由贸易勾画多赢蓝图



◎甄雪原

一次未如愿的考试成就了一位 WTO 专家

提起张汉林，人们总会把他与 WTO 相联系，这位现年 41 岁的学者，如果以联合国对当年年龄段的区分，还还算青年，可已经称得上是中国 WTO 研究的领军人物。他用他的执着与勤奋，在过去的十余年间，深入钻研国际经济贸易政策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，接连出版了研究世贸组织专著 20 多部，发表论文 300 余篇。

出生在贵州遵义的张汉林，称自己走上外贸研究之路是缘于一次未能如愿的研究生考试。“学会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”是当年张汉林高考时的流行语，出于对“铸造”两字的好感，张汉林选择了武汉理工大学学习机械铸造。4 年以后，张汉林以一篇获得优秀大学生科研成果奖的毕业论文，完成了本科学业。但是，当他报考清华大学铸造研究生时，却以两分之差落榜。

在武汉理工大学留校工作两年后，张汉林考取了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研究生，完成了一位理工科生向文科生的转变。这使他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。张汉林很庆幸自己的理工科底子，他说，学理工时打下的数学基础，对于他后来掌握宏观经济学、西方经济学等有很大的帮助。学理工的人会以更多的视角，去对问题进行综合的分析。比

■美加观潮

食不敢恭维

◎徐程

北美的食，实不敢恭维。首先北美人把一切都工厂化了，食物也不例外。麦当劳、肯德基等被称作“Junk Food”(垃圾食物)，但不乏拥趸者。我有个朋友已近 50 岁了，他坦率地告诉我，I like junk food。年轻时一天不吃没法活，上了年纪后，尽管各种批评说这种食物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但还是喜欢吃，只是吃得少一点。

除了垃圾食物外，还有一种叫 Fast food，包括 Burger king、Subway、Wendy's、Pizza Hut、Taco Bell、Arby's 等等。这些食品营养是足够的，味道也不错。其中的必胜客在中国已成为上档次的食品，我曾吃过几次，的确比北美的好吃，而且店堂也比较正规，有点像大西餐馆的格局，不像在北美连个正经桌子都没有，大家吊儿郎当地填饱肚子走人。但国内的必胜客贵得惊人，一人至少 80 元才能打发。不像在北美三四美元钱就可以吃一顿比萨。最近听说深圳也有 Taco Bell 了。而且生意不错。那是墨西哥食物，尽管美国人认为墨西哥食物好吃的不得了，但我吃过一次决不会再吃第二次的。实在不习惯那种味道。由此可见我们不是小国寡民，真是有容乃大，什么食物在中国都有一席之地。上海的淮海路上还有糖那滋呢，照样人头攒动。我深感自己的偏狭，在北美我最不待见的食物，在国内大行其道。

比较起来，Subway 我是最喜欢的。它其实是一个潜水艇形状的面包，里面有牛肉蔬菜，可根据要求加各种佐料，做成后满满当一包。有时中午会看到许多西装革履的白领在公园里精心对付一大捧 subway。快餐比垃圾食物较少地为人诟病。因为它营养足，又不经过油炸，但价格略高于 junk food。如一个 subway 一般在 7 美元左右。你要是以为北美人总是吃得那么秀气，那可就错了。他们上正式餐馆时食量惊人。有一次我们为学习小组的一位女同学做项目成功了，她请我们吃牛排。三人一共吃掉 360 美元，还不包括小费。我记得一个大土豆

中国需尽快改变重出口指标、重出口速度这样一种贸易发展模式，而去追求有管理的贸易自由化政策体系。中国的贸易体系不能是过去单纯的货物贸易，要有服务贸易，有投资，有知识产权。这样中国才能形成一种综合的、立体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体系。

如研究 WTO，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，也不是纯粹的经济学问题，而是经济学、法学、管理学、政治学集于一身的、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领域。表面上，WTO 似乎只表现为经济贸易问题，其实背后表现的是各成员国之间国家利益、政治关系的博弈。

张汉林与 WTO 的结缘从读研时开始。当时中国已经提出复关申请，作为外贸部所属的中国外贸大学，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一些中国复关的研究，并将这些课题带到了教学中。这给张汉林的研究方向带来很大影响。从此，张汉林师从老教授陈同仇潜心研究国际贸易政策理论。

1990 年底，张汉林提前半年完成了硕士论文答辩。他以 9 个月时间写就的毕业论文《战后美国贸易政策的理论与实践》，以新的视角深入分析了贸易政策理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，并着力研究剖析了美国在 WTO 中所产生的影响与作用。论文被当时的国际贸易系的主任称为少有的佳作。

张汉林再一次被留校。1991 年，27 岁的张汉林参与到学院关贸总协定研究会的筹备工作中，并出任副秘书长一职，他的学术生命从此跟 WTO 联在了一起。10 年后的 2001 年，他凭着在 WTO 学术研究上的权威性和影响力，被中央电视台特邀为唯一嘉宾，主持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全程直播，见证了“中国入世”的历史性时刻。

在推动两岸四方的自由贸易区方面，多作一些努力

现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院长的张汉林，同时还兼任商务部、农业部等部委世贸组织法律顾问，教育部政策法规顾问，北京、广东、山东、上海等省市顾问，

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，北京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。

“如果说我参加工作的前十年，是为中国加入 WTO 作了一些工作的话，那么今后 10 年的工作目标，是希望在推动两岸四方的自由贸易区方面，多作一些努力”。早在 1999 年便提出港澳与内地实现自由贸易区主张的张汉林，现今心中的设想更加具体。

在他的思路中，在未来 10 年之内，应该实现内地与港澳台贸易的完全统一，然后再用 5 年左右的时间，实现经济政策、货币的融合。张汉林对这样的预期有着充足的理由，他强调，中国大陆的 GDP 相信会达到 4 万亿美元，内地与港澳台四方的经济总规模，起码应该达到 4.8 万亿到 5 万亿美元的水平；中国大陆的对外贸易会达到 2 万多亿美元，四方的贸易总额加在一起应该在 2.5 万亿到 3 万亿美元之间。到那时，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走向全球化的货币，中国是不能实现中华民族真正的复兴的。

在贸易摩擦中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

除了对两岸四方如何实现经济一体化的研究，张汉林与他带领的团队，目前还参与着例如“WTO 主要成员贸易政策体系与中国的对策”、“WTO 与国家经济安全”等一系列对国家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研究课题。

早在 2003 年，张汉林已经估计到，中国将进入贸易摩擦的高峰期，这一被当时称为“哗众取宠”的判断，现在已经得到事实的证明。对于这个问题，张汉林表示，贸易摩擦不会是短时的，它会被常态化，今后这种情况会司空见惯，而且会触及到各个领域。10 多年前，美日、美欧、美

韩之间的贸易摩擦，与中国目前的状况是一样的。所以，国人应该要以平常心对待。

其次，中国越多参与经济全球化，中国的经济贸易对全球经济贸易的影响也就越深越广。任何一个小小的贸易摩擦，都可能变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结果。贸易摩擦问题，既要从技术层面解决，也要着眼于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。因此中国要加快建立与形成一个反倾销的应对机制，研究相关策略，以争取在贸易摩擦中尽可能地求得国家利益的最大化。

张汉林还提请注意，现在中国的贸易规模居全球第三，但是却有那么多的贸易摩擦，出口的货物利润也不大。所以中国需尽快改变重出口指标、重出口速度这样一种贸易发展模式，而去追求有管理的贸易自由化政策体系。中国的

贸易体系不能是过去单纯的货物贸易，要有服务贸易，有投资，有知识产权。这样中国才能形成一种综合的、立体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体系。

不让一日闲过

在张汉林办公室的墙壁上，一幅写有“不让一日闲过”的木刻十分醒目。开始学术生活之后便从没有在夜晚一点以前休息的张汉林，承认自己是“工作狂”。他说，“我的个人生活并不平坦，患病的前妻早早地离开了我，这对我是很大的打击。但从中我对于生命的意义也有所领悟，生命不在长短，关键是你看你对周围的群体，对社会，对国家做了什么，如果你做过一些有益的事，那么就足够了。”

■本期人物话语



减排措施首选经济法制手段

马凯(国家发改委主任)7月4日在政协十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作“关于节能减排问题”报告时说，在行政措施之外，经济和法律手段将会是政府完成“十一五”规划中节能减排目标的首要选择。下半年已确定的政策有，将理顺煤炭价格成本构成机制，推进成品油、天然气的价格改革，已经实行的差别电价将会视情况逐步扩大范围等。同时，国家将适时出台燃油税，研究开征环境税，调高资源税也已提上日程。

■多声道

解决行政手段对市场造成扭曲 必须釜底抽薪

吴敬琏(全国政协常委、经济学家)7月4日接受《新京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政府如不釜底抽薪解决之前行政手段对市场造成的扭曲，5 年完成节能减排目标，形势“不太乐观”。既然现在的行政定价无法反映资源稀缺度，那如何遏制企业的盲目扩张？价格必须放开，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。政府不能一直用行政手段，要求地方怎么样，企业怎么样。既然之前的行政手段造成了问题，那么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釜底抽薪把它们拿掉。用行政来纠正行政，这个办法很吃力，效果也不可能好。

外汇管理局将及时增加 QDII 投资额度

李东荣(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)7月4日在参加“湖南金融服务创新综合试点进展及成效发布会”上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称，国家外汇管理局同中国银监会、中国证监会、中国保监会等部门，近来不断探索和推进 QDII，相关业务建设自今年第二季度以来已取得可喜进展。自允许银行等机构进行境外理财以来，目前国家外汇管理局总计已批准 205 亿美元的投资额度。随着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(QDII)资格获得者增多和境外理财业务拓展，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及时增加 QDII 的投资额度。

中国发展为美国提供机会

保尔森(美国财政部长)7月2日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，美中发展紧密经济关系对两国都至关重要，中国的快速发展也为美国提供了机会。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，这是事实，而有一些人可能将此认为是一个问题，但对美国商品和服务来说，中国则提供了一个快速发展的市场。因此，“我将这(中国的发展)视为一个机会，我也愿意抓住这个机会”。

不让快牛变慢熊 4000 点是关键前提

刘纪鹏(首都经贸大学教授)在7月6日全景网(《证券时报》转载)上的文章中提出，从历史上看，由于错误的方法论导致资本市场在 2001 年几乎全军覆没，引发暴跌的原因是非经济的因素，经济增长很好，股市却掉入了休克疗法的误区。今天，随着制度的改变，股市实现了本轮牛市的局面。此次最重大的制度改革是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，它让中国政府、中国人真正看到了自己资产的价值。在股权分置改革开拓出来的机遇面前，我们现在应该正确看待 4000 点。4000 点是中国资本市场、中国经济蓬勃向上最低的基本价点，这个点是我们必须要守住的，只有在这个点位上才可以化解很多历史遗留的矛盾，这都需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，这只有在 4000 点上才可以完成。(摘编：雨人)

■西方经济学流派一瞥

重商主义 支配欧洲 300 年

◎陈国营

所谓“无商不奸”，一说起重商主义，国人通常还是习惯把它和“唯利是图”的商业本性挂钩，也由此对西方经济学长期以来多持一种批判的态度。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，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才日趋客观，既注意其受制于意识形态影响，更注重探讨其所揭示出的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，以便更好地为我所用。

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纷呈，你方唱罢我登台。从发展历程来看，西方经济学思想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。重商主义约产生于 15 世纪末，18 世纪中期开始走向没落，支配了西方经济主流话语近 300 余年。彼时，西欧封建制度趋于瓦解，城市兴起，在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；航海发展和地理大发现大大拓展了贸易范围，加之西半球金银矿的发现，贸易日益繁荣；西欧各国都力图攫取殖民地和势力范围，国家间的竞争日趋激烈。正是在那样的历史环境下，一个主张建立强大中央集权、拥护国家干预主义和殖民主义，为经济掠夺进行辩护的学派——重商主义学派兴起。

重商主义的重要信条之一是只有金银货币才是真正的财富形态，将财富多寡等同于拥有金银的数量，金银是衡量一国富强与否的标准。

获取金银财富有三个途径：第一，生产金银，如开采金银矿藏，但这要受限于自然矿藏；第二，通过对外贸易——扩大出口，限制进口，保持贸易顺差和硬通货净流入；来增加和积累财富；第三则是掠夺，殖民扩张以扩大贸易和获取金银。

重商主义认为一切经济活动和经济政策制定与执行，都应该是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金银货币，因而主张国家要积极干预经济生活。在政治上，重商主义认为必须建立强大中央集权，对全国实行统一的管制措施，扫除国内封建割据，各种路税费等内部障碍(内部贸易壁垒会提高商品价格，削弱出口竞争力)，垄断贸易特许权，通过立法和行政等手段，限制进口，鼓励出口。在军事上，重商主义主张建立强大的军队，对外殖民扩张，掠夺殖民地原材料，以抑制殖民地的制造业，便于向其倾销商品获取黄金白银，甚至直接掠夺殖民地金银矿藏。恩格斯就曾对此作过十分形象的描述：“各国彼此对望着，就像守财奴一样，双手抱住他心爱的钱袋，用妒忌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的邻居。”

为此，当时西欧不少国家制定了非常残酷的对内对外法律和政策。英国在 1565 年至 1566 年的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，就颁布法律禁止出口活羊，违者被处没收财产、一年监禁和砍掉左手，第二次触犯此法则将被处死刑。如此酷法，初衷就是尽力保护本国能够生产的制成品和原材料，严禁出口以保持国内制成品的竞争力。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统治时期(1509—1547)，绞死了 7200 名小偷；1536 年颁布的法令规定“身体健全的流浪汉”将被割除耳朵，第三次被发现的流浪汉将被处以死刑，如此残酷立法目的是促使更多的人加入劳动力大军，维持较低工资水平，从而降低出口产品的价格来提高价格优势。在对外方面，西欧国家加入了对外扩张行列，掠夺原材料和倾销商品，甚至从事臭名昭著的黑奴贸易和鸦片贸易，牟取的巨额白银和黄金源源不断流入母国。可以毫不客气地说，重商主义学派以商为重，真正是不折不扣的唯利是图。

历史地看，重商主义对世界近代经济发展史具有重大影响。与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社会等级排序一样，中世纪的西方对谈判和经商也嗤之以鼻，而重商主义学派尽力提高商人地位，鼓励经商；另外，伴随重商主义而来的如建立国内贸易统一市场、重视国际贸易，以及其民族主义倾向等信条也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生活的重要内容。20 世纪 30 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时期，各国竞相提高关税，贬值本币以限制进口扩大出口，结果进一步加剧了危机；许多发展中国家曾经倡导出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；进入 21 世纪，贸易保护主义在发达国家又不时抬头，政府对贸易多有不同程度的干预，如进出口许可证、配额制度，还有保护国内产业和行业的竞争等等。

但是，重商主义学派混淆了货币与财富，货币与金银，夸大了金银货币的作用；又过于强调贸易顺差；其经济干预主张包括贸易管制等政策，也增加了政府和官员寻租和腐败的机会，阻碍经济持续发展。重商主义最丑恶的记录是对内对外的野蛮掠夺和扩张政策，造成了人类的深重灾难，因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。